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六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国大学生的信上签字，因我仍不理解和没法接受这封信的内容。”

我正是在这种政治思想上充满矛盾和纠结的状态下，抱着向党交心的意愿，将这份陈述自己对反右派斗争问题上的真实想法和看法的汇报材料交给当时的班党支部书记石世奇同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份材料显然是一份典型的可供批判的反面材料，按规定是要存档备案的，可能会有对我极为不利的后续处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石世奇同志看了以后，并没有按照惯例上交给上级领导，而是悄然还给我，并特别嘱咐我自己保存好。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身边保存至今的这份文字材料已成了我如烟往事中一段特殊成长旅程和心路历程的历史记录，一件石世奇同志和我之间隐秘关系的历史物证。

多年以后在56级老同学一次聚会上，同窗好友听了我的这一段往事的讲述，都感到意外地惊奇。此前他们对此事毫无知晓，想不到当年我对反右派运动这一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上，藏有连身边同窗都觉察不到的大“秘密”。他们说我是值得十分庆幸的，当时没有被波涛汹涌的反右浪潮吞没掉，算是“逃过一劫”；有的说这桩“过去从未言及的往事”，可谓是“颇具特色的传奇”故事，是令



1961年56级经济系学生毕业合影
前排右四党总支部书记龚理嘉，右六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右七系主任陈岱孙，右八周炳麟教授，右十罗志如教授，右十一樊弘教授，后排右五赖荣源（中国新闻社摄）

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有的还指出石世奇同志那样做并非偶然，那时他也保护了同窗中许多其他涉世不深的小字辈（中学毕业生，不同于年纪较大而阅历较深的调干生）。回忆这段经历，当年在特殊复杂的历史条件下，石世奇同志作为党支部领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党性原则，心胸坦荡，敢于仗义执言，据理力争，尽力保护了班上那些曾发表过激言论的同学尤其是呵护那些天真无邪、心灵稚嫩的一群平时他戏称为“金童玉女”的小字辈，使他们得以“过关”，免于被划定为右派的命运。他在关键时刻作出的上述传奇式举动，使我这一未谙世事的归侨学子得以“幸免于难”。他对我的问题材料非同寻常的处理办法，像一只无形的援手“瞒天过海”，帮助我“蒙混过关”，使我得以免遭沦为所谓“反右补课对象”的厄运，

同时也解除了此后在各项运动中头上可能要顶着“漏网右派”的无形帽子的后患。反右派运动的这番境遇，使我能够“有惊无险”地迈过了自己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个重要关口，能够“轻装上阵”继续走好我的人生道路，能够“与时俱进”一步一个脚印沿着党指引的方向走。从此，我将石世奇同志视为完全可以信赖的知己，一位胜似兄长的同窗好友，在学习、工作和生活遇到问题和困难，都乐于找他交谈商量，请他“解疑释惑”，而他每每都能给我悉心的关怀、帮助和鼓励。从大学本科开始直至退休以后，我一直乐于找机会跟他就我感兴趣的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及相关的时事问题谈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和看法，跟他倾心探讨问题，交换意见，从中我经常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思想认识上新的收获。在我的成长旅程

中，他对我确是有知遇之恩的，是我人生旅程中遇到的一位贵人。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反右斗争运动后期，进行整党时，56级党支部被批评为领导右倾，斗争不力，没有落实上级要求，右派划得少，划得晚，石世奇同志因此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难能可贵的是，石世奇同志遭受到这种错误的公正待遇之后，却能够表现得“忍辱负重”，淡定从容，无怨无悔，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名利，一如既往始终积极地发挥着共产党员应有的作用。

在北大本科学习时我们不但经历了反右派斗争刻骨铭心的严峻考验，而且还要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从1958年至1961年期间学校组织我们走出校门，辗转于北京市郊区和周围县镇，三下农村，先后驻留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怀柔县的东流水庄大队和通县的高碑店人民公社，三个地方驻留时间长短不一，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调查研究和宣传，参加相关的宣传和筹建工作，跟农民同住，同劳动，同吃集体食堂的大锅饭。其间还根据当地的实际联系情况安排开课题生学位。实际上，根据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兴趣，毕业时我填报的志愿首选是分配方案中的一个涉外研究所，但结果未能如愿，不免令人不能释

怀。多年之后有机会询问当年掌握情况的石世奇同志，这是否与当时我的归侨身份有关。他如实地将事情的原委告诉我，事实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当时主要是考虑我生性酷爱读书学习，成绩也优秀，年纪又轻，有培养前途，将我保送攻读研究生学位较为合适。此时我才意识到原来自己真是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

上世纪50年代末，北大经济系根据中央教育部的指示，为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率先在全国创建世界经济专业，经济系根据我对国际问题研究的志趣与意愿，批准我选修世界经济专业美国经济研究方向，这样我就成了文革前北大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正式培养的首位也是唯一的研究生。

当年世界经济专业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专业，世界经济教研室的成员是清一色的年轻教员，仅有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赓先生因病早已退休，唯一的资深讲师就是教研门办学的活动等。此后我们还组织两次下厂，夏天到北京市石景山钢铁厂进行劳动锻炼，在大跃进热火朝天的气氛中，参加当时的大炼钢铁运动，冬天又下该厂和工人相结合，组织学习毛泽东著作，编撰题为《毛泽东论经济》的通俗读物。

大学本科五年学习期间，在当时提出